

她时代观点

婚变报告反腐如何中看又中用

文/杨燕明

为了监管干部在“八小时外”的表现，南京将对其建立“特别监督档案”。南京市委2月2日公布了《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“重能轻德”的若干规定》，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、子女配偶移居国外，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。(2月3日《扬子晚报》)

领导干部如果婚变、子女配偶移居国外，必须5天内向组织报告，这做法，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，但其善意初衷不言而喻，便是要更好地规范与约束官员们的行为，以便规避不必要的道德风险，如领导干部任人唯亲、拉帮结派、搞小圈子文化等。若领导干部报告了，组织上最起码有一定了解，便也能更好地将这些问题进行规避。目的是为了规避这些问题，便道出了这项规定的最终指向——为了反腐。

事实上，“婚变报告”并非新规，而是常识重申。以南京为例，早

在2005年，其便出台了《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》，其中首次明确规定：“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作书面报告，报告要说清婚姻变化的基本理由、基本情况。”此后，2007年的北京，2008年的长沙，均出台过类似规定。由此可见，领导干部“婚变报告”并非侵害官员隐私的一种写照，只不过是监管链条不断深入的一种必然结果。

客观来说，作为公职人员，领导干部的确要让渡一部分私权，这其中，便包括婚变这样的私事。毕竟，倘若领导干部婚变了却不报告，其重用妻子家人，在监管上的确存在很大的难度。而除此之外，值得公众担忧的还有：这样的“婚变报告”，说到底只是一种单向的反腐规定，对领导干部而言，抽检4%的做法，很难激发他们的“报告动力”，再加上谁来监管谁来核实的现实，“婚变报告”式新规，很可能只是观赏性规定。

事实上，类似的反腐新规之前也

有不少，如网络游戏反腐；如聘请党政领导一把手的妻子担任生活和社交圈的监督信息员；再如廉政开机语等等。可以说，这些反腐规定，从形式上来讲，都有一定的创新。但是，这些规定的现实执行效果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：一些规定重申多次，都没有得到很好执行；一些规定从颁布开始，便只是纸面上的美好。这样的现实尴尬，也足以证明一点，反腐仍需要抓住核心问题。

这便是说，对于反腐而言，的确不需要过多的花拳绣腿，只需要扎扎实实的财产申报与严厉的问责机制即可。客观来说，财产申报与问责机制，我们并不缺失，如今要做的，也只是执行到位置了。“婚变报告反腐”如何中看又中用？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，即只要一切回归到制度本身，严格执行当下的相关规定即可。毕竟，与出台什么样的规定相比，公众更关注相关部门执行了多少。

社会观察

不必对“最土豪聘礼闹分手”做过度解读

文/李忠华

去年2月16日，浙江台州温岭一组“土豪订婚照”在微信朋友圈里疯传。照片里除了金条、银条和金首饰等聘礼外，还有几个袋子微开的袋子，可以看到里面装着一捆捆百元大钞，据说聘礼总价值500万元。没想到，双方订婚不到一年就闹着“离婚”，男方向女方索要全部聘礼，并诉讼至法院。最后，法官结合当时热传的微信照片，才调解成功。(2月3日《今日早报》)

这场聘礼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，并使某些网友“羡慕嫉妒恨”，无非是下聘礼的男主角，一掷千金土豪般的一下子拿出500万元，作为对女方的聘礼。然而，幸福的爱情与婚姻果真与聘礼的多少成正比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那么，作为旁观的网友，又何必对“土豪聘礼不到一年闹分手”倍感惋惜、遗憾而做过度解读呢？

实事求是地说，幸福的爱情与婚姻，原本与聘礼的多少并无实质性的关系。那么，土豪聘礼的当事男女主角，因生活方式、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矛盾，就闹着急于要分手，

并因返还聘礼起纠纷而对簿公堂，这恰恰不仅折射出男女双方爱情基础的不牢靠，更折射出对爱情的理解有偏差和失误：一是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钱，爱情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幸福；二是认为男方出的聘礼越多，证明男方的爱越深；三是认为婚姻是人生一辈子当中最大的事，聘礼当然也要风风光光、凸显土豪气，于是攀比心、虚荣心作怪，致使天价聘礼屡屡见诸报端。但始终应该明白的是，男方出的聘礼多，并不代表越爱女方，幸福的爱情婚姻与金钱的多寡并无直接关系，而是要看双方是否有稳定的情感基础、对爱情的忠诚度以及对未来婚姻的付出和呵护。

爱情原本就需要宽容和理解，因生活方式、生活习惯不同，自然很容易产生矛盾。但有了矛盾并不是束手无策，更不是以此闹分手的理由和借口，而是需要当事双方平心静气，坐下来耐心地进行沟通，加强理解。如果连这一点宽容和耐心都没有，那么，即使聘礼下得再土豪，也确实没资格和能力来享受这份幸福美满的爱情与婚姻。

惊闻“店内激吻”的小偷是留守儿童

文/张西流

1月20日晚，自贡富顺一家饰品店遭遇小偷光顾，整个盗窃的过程被店内监控全部拍了下来。监控录像显示，两小偷就像在自家一样走来走去，两人在盗窃成功后，现场热吻起来。2月3日，记者从富顺警方获悉，目前该案作案者已经归案，涉嫌盗窃的三人为在读留守学生，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后，三名学生已被家长带回。(2月4日《华西都市报》)

一对小偷情侣，在入店盗窃得手后，为庆祝“胜利”，居然在店内忘情地激吻起来。虽然这是在报道一个盗窃案件，但因为有小偷“店内激吻”的情节，给这个新闻增添了娱乐元素，令人忍俊不禁。然而，案件破获后，当警方告知“店内激吻”的小偷是未成年人，是留守儿童时，想必人们再也“娱乐”不起来了。

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今天，全国有近5800万留守儿童散落在广大农村各个角落，像野草一样自生自长。由于长年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爱，长久缺少与父母交流的机会，失却了畅通的倾诉渠道，他们可能产生种种心理病症，如感情脆弱、

自暴自弃、焦虑自闭、悲观消极等。而一旦形成了畸形心理，进行矫正教育则比其形成过程更为艰难。就拿这3名入店盗窃的留守儿童来说，盗窃已涉嫌违法犯罪，而“店内激吻”表明他们已经性早熟和早恋，这也是留守儿童存在的共性问题。

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和涉及到的系列问题，成因复杂，远非盗窃和早恋这么简单。为此，针对留守儿童问题，很多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研究人士，都曾积极呼吁社会承担责任，防止我们的下一代出现问题。

首先，应该构建政府、社会、家庭、学校等“四位一体”的教育和监护体系，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场所建设，真正为留守儿童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。同时，学校不仅要完成校内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，而且应有意识地把注意力向留守儿童校外生活延伸，填补他们在校外的生活空间；应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档案，加强留守儿童生活技能和生存能力的教育培养，并增设法制和心理教育课程，积极组织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。特别是，外出务工的父母，有条件的应尽量带子女到务工学校入学，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，最好的成长就是与父母在一起。

教育评弹

放鞭炮贴“神符”是为了学校安全？

文/毛开云

学生还没考完试，学校夜间竟在校内大肆燃放鞭炮，还在墙上贴“神符”，这是2月3日晚发生在位于民众镇的中山联翔(德恒)学校内的一幕。该校高中部一位柴姓教务处主任表示，“可能是初中部搞的活动，放鞭炮不影响学生。(贴“神符”)还挺吉利的”。(2月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学校属于公共场所，在公共场所放鞭炮、贴“神符”是明令禁止的。在公共场所放鞭炮，除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还存在污染环境的问题；在公共场所贴“神符”，涉嫌宣传封建迷信，特别是在学校贴“神符”，无疑会给学生传递不健康、不科学的信息，所以必须立即制止。

在公共场所放鞭炮、贴“神符”，

这种事情一般只能发生在寺庙里。而学校不是寺庙，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；校长不是住持，而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者、执行者；教师和学生不是和尚与尼姑，而是教育教学的两大主体。在学校放鞭炮、贴“神符”，这种做法与党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，与学科学、讲科学、用科学的氛围格格不入。

按照学校领导的解释，放鞭炮、贴“神符”是为了学校和师生安全。然而公众要问：学校放了鞭炮、贴了“神符”，就能保证学校和师生安全吗？倘若放了鞭炮、贴了“神符”之后，学校和师生依然出了安全事故，学校将如何向师生交代？如何向社会交代？放鞭炮、贴“神符”是为了安全，这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。

笔者当过10多年中学教师，但在想不出学校为啥这么做的理由。既然学校说是为了安全，那就说说学校安全吧！学校已经放鞭炮、贴“神符”了，按理说学校就应该安全了，是不是学校的保安、保卫都可以辞退了？是不是学校的规章制度都可以废除了？是不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对这个学校都不起作用了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学校的安全不是放鞭炮就能保证的，更不是贴“神符”就能万事大吉的。做好学校的安全工作，必须强化安全意识，落实安全措施，做好安全预案，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如果学校抱着“贴‘神符’还挺吉利的”的思想抓学校安全工作，不但抓不好，估计猪也会笑了！

一针见血

逼人跪狗 冷漠暴戾流失人性温度

文/杨朝清

“你给我的狗跪下来！”在广东佛山市某宠物门诊内做完绝育手术，宠物狗一天后死亡，争论之下，狗主人怒斥兽医，要求参与手术的两名兽医(一人事发时不在店内)必须向死去的宠物狗赔礼道歉。最终，59岁的兽医当着门诊内众人的面，“被迫”给宠物狗尸体下跪约一分钟。(2月3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近年来，“逼人跪狗”不时进入公众视线，一次又一次地触碰老百姓关于尊严和权利的敏感神经。医疗纠纷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，理应在法治框架内解决，然而，一些情绪失控、心理失衡的人们，将宠物之死归咎于医务人员。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之下，医务人员不仅承受着身体的伤害，也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。

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原子化、社会关系的弱化和情感生活的淡化，经常导致以宠物作为情感支持的替代品。

小猫小狗在有些人看来不值一提，有些人却视为珍宝，甚至把它们作为不可分割的家庭成员。尽管这条宠物狗并不贵重，却陪伴了狗主人七八年，已经成为生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；宠物狗死亡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情感断裂，非当事人通常难以理解。

在身份社会逐渐向专业社会过渡的当下，医务人员的社会认同，越来越少取决于身份标签，越来越多地依靠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。不论是指责兽医水平低劣，还是质疑兽医的职业操守，抑或怒骂兽医只顾赚钱、未及时告知手术风险，兽医的角色扮演没有得到狗主人的尊重和信任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升级。

作为一种“弱者的武器”，下跪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频繁上演。下跪这样的自我矮化、自我鞭笞，让人们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赢得了舆论的声援。这一次，兽医在外部压力之下，无奈而艰辛地下跪。在这起医疗纠纷中，

尽管两位兽医存在着操作失当等问题，但“逼人跪狗”却践踏了劳动者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。

透过“逼人跪狗”这面镜子，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转型时期一些不良的社会心态。当人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，对他人命运的麻木冷漠很难说不是必然。“逼人跪狗”所体现出来的暴戾心态，在本质上是炫耀武力；暴戾情绪的弥漫，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。

“逼人跪狗”的初衷，在于表达对宠物的情感和对兽医行为失范的不满。只不过，一旦利益博弈偏离法治框架，就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。“逼人跪狗”说到底是一种价值排序上的错位，冷漠暴戾之下，又怎么会有人性的温度和宽度？有着起码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，才会懂得用更加理性的方式进行消费维权，才不会“一轻率，就犯糊涂”。

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，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《今日女报》的稿酬。因各种原因，本报未能联系到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，请与本报联系(0731-82333623)。